書名
編號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毛 著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中國人民解放軍
宣傳部
圖書館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毛澤東著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中國革命戰爭的
戰略問題

著者：毛澤東
出版者：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華北新華書店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目錄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戰爭……一——一五
一、戰爭規律是發展的……一
二、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戰爭……五
三、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六
四、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一〇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戰爭……一六——一九
第三章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二〇——二六
一、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二〇
二、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二一
三、由此產生我們的戰略戰術……二四

第四章　圍剿與反圍剿……一一七——三一
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形式……二七
第五章　戰略防禦……三一——七七
一、積極防禦與消極防禦……三二
二、反圍剿的準備……三六
三、戰略退却……三八
四、戰略反攻……五二
五、反攻開始問題……五四
六、集中兵力問題……六〇
七、運動戰……六七
八、速決戰……七二
九、殲滅戰……七五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毛澤東

這本小書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為當時紅軍大學的教本而寫的，目的在總結內戰的經驗。只完成五章，尚有戰略進攻，戰略轉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許多問題，沒有功夫再寫了。四年來只有油印本，茲應軍政雜誌社之請，用鉛印出版，藉供黨內同志們參考。這是一場大爭論的結果，是表示一個路綫反對另一個路綫的意見，對於目前的抗日戰爭還是有用的。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著者識。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戰爭

一　戰爭規律是發展的

戰爭規律——這是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革命戰爭規律——這是任何指導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中國革命戰爭規律——這是任何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從事戰爭，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環境裏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的戰爭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大家明白，不論做什麼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他的性質，他與以外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戰爭——從有階級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與階級、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政治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之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不懂得他的情形，他的性質，他同以外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戰爭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導戰爭，就不能打勝仗。

革命戰爭——革命的階級戰爭與革命的民族戰爭，在一般的戰爭情形與性質之外，有他特殊的情形與性質。因此在一般的戰爭規律之外，有他的一些特殊的規律，不懂得這些特殊的情形與性質，不懂得他的特殊的規律，就不能指導革命戰爭，就不能在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中國革命戰爭——不論是國內戰爭或民族戰爭，是在中國特殊的環境之內進行的，

比較一般的戰爭，一般的革命戰爭，又有他的特殊情形與特殊性質，因此在一般戰爭與一般革命戰爭的規律之外，又有他的一些特殊的規律，如果不懂得這些，就不能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所以，我們應該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也應該研究一般革命戰爭的規律，最後，我們還應該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有一種意見是不對的，我們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就是說：只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就得了，具體的說，只要照着中國政府或軍事學校頒佈的那些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這些條令僅僅是一般戰爭的規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國的，如果我們一模一樣照抄來用，絲毫也不變更其形式與內容，就一定削足適履，要打敗仗，他們的理由是：過去流過血來的東西，爲什麽要不得？不知道我們應該尊重過去流血的經驗，但還應該尊重自己流血的經驗。

又有一種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就是說：只要研究俄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就得了，具體的說，只要照着蘇聯內戰的指導規律及其頒佈的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蘇聯的規律與條令，包含着蘇聯內戰與蘇聯紅軍的特殊性，如果我們一模一樣抄了來用，不允許任何變更，也同樣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他們的理由是：蘇聯是革命戰爭，我們也是革命戰爭，而且蘇聯是勝利了，爲什麽還有取捨的餘地？不知道我們應該尊重蘇聯的經驗，而且應該比較歷史上的及別國的東西，還要更加尊重

些，因爲他們的是最近代革命戰爭的經驗。但尤其應該尊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爲的是中國革命與中國紅軍又有許多特殊的情況。

再有一種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就批駁了這種意見了，就是說：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最好的，我們應該學習他，具體的說，學北伐戰爭的長驅直進與奪取大城市。他們不知道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應該學習的，但不能刻板抄用，因爲我們現時戰爭的情況已經變化了。我們只應該採用北伐戰爭中那些在現時情況下還能適用的東西，我們應該按照現時情況規定我們自己的東西。

由此看來，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與性質的差別。從時間條件說，戰爭與戰爭指導規律都是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有各個歷史階段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有其特點，不能呆板移用於不同的階段。從戰爭的性質看，革命戰爭與反革命戰爭，革命的階級戰爭與革命的民族戰爭，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互相移用。從地域條件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均有其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有其特點，同樣不能呆板移用。我們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與民族上的戰爭指導規律，應該着眼其特點，與着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中的機械論。

還不止此。一個人指揮戰爭，小兵團的指揮與大兵團的指揮是不相同的，起初會指揮小兵團，後來又會指揮大兵團，這對于他是進步了發展了。一個地方與許多地方也不相

同，起初會在某一高級的地方作戰。後來在許多地方也會作戰，這對於他又是進步了發展了。因為戰爭有了技術、組織、戰術、戰略的發展，一個戰爭中各階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級階段會指揮的，到了高級階段也會指揮。這對於他更是進步與發展了。停頓於某一定兵團、一定地方，一定階段，這時就沒有進步與沒有發展。有一種人，抱着一技之長與一孔之見，再也沒有進步，這對革命說則在一地一時有些作用，但沒有大的作用，我們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戰爭指導者。一切戰爭指導規律，依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依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

二 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戰爭

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人類社會的發展終究要把他消滅的。而且就在最近的將來會要把他消滅的。但是消滅他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歷史上的戰爭，只有革命與反革命的兩類，我們是擁護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的。神聖的戰爭，僅僅屬於革命戰爭一方面，我們是擁護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與神聖的階級革命戰爭的。人類的生活是由三個大時代組成——人類和平生活時代，人類戰爭生活時代，與再一個人類和平生活時代。我們現在共處在第二個與第三個時代的

點，人類戰爭生活時代將要由我們之手而結束，我們所做的戰爭，毫無疑義的是最後一次戰爭。我們的戰爭是最後的一次，但是無疑義又是最大的與最殘酷的一次。最大與最殘酷的反革命戰爭，迫臨在我們的頭上，我們如果不打起革命戰爭旗幟，人類的大多數就要遭到毀滅。人類革命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人類的旗幟，中國革命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中國的旗幟。人類大多數與中國大多數舉行的戰爭，毫無疑義的神聖戰爭，是正義戰，是拯救人類是拯救中國出於毀滅的至高無上的榮譽的事業，是把全歷史轉到新時代的橋樑，是把全地球造成新世界的燈塔。我們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出發於我們消滅一切戰爭的志願。

三　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

世界是戰爭的一全局，中國是戰爭的一全局，一獨立的游擊區，一獨立的蘇區、或以大的獨立作戰方面，也是戰爭的一全局，凡是帶有要照顧各方面與各階級的性質的，都是戰爭的全局。

研究帶全局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略學的任務。研究帶局部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役學與戰術學的任務。

向着戰役指揮員及戰術指揮員要求了解某種程度的戰略上的規律，何以成爲必要呢

了？在於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在於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於全局性的東西的。說戰略勝利決定於戰術勝利的這種意見，是把經給他說顛倒了。因為這種意見沒有看見戰爭的勝敗，主要與首先的問題，在對於全局與各階段關照得好或關照得不好來決定。如果全局與各階段的關照有了重要的缺點或錯誤，那個戰爭是一定要失敗的。說『一着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的帶全局性的，即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着，而不是某種帶局部性的即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一着。下棋如此，戰爭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東西，不能脫離局部性而獨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某些局部破壞了或失敗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響，是因為這些局部不是對於全局有決定意義的東西。戰爭中某些戰術或戰役的失敗或不成功，常常不至於引起戰爭全局的變壞，就是因為這些失敗不是決定意義的東西。但若組成戰爭全局的多數戰役失敗了，或有決定意義的某一二個戰役失敗了，全局就立即起變化。這裏說的多數戰役與某一二個戰役，就都是決定的東西。戰爭歷史中有在連戰皆捷之後吃了一個敗仗以至全功盡棄的，有在吃了許多敗仗之後打了一個勝仗因而開展了新局面的。這裏說的『連戰皆捷』與『許多敗仗』，都是局部的，對於全局不起決定作用的東西。這裏說的『一個敗仗』與『一個勝仗』，就都是決定的東西了。所有這些，都在說明全局關照的重要性。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主要的是依據情況，照顧部隊與兵團的組成問題，照顧兩個戰役之間的關係問題，照顧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

關係問題，照顧我方全部活動與敵方全部活動之間的關係問題，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與最吃力的時節。如果丟了這個去忙一些次要的問題，那就要難免要吃虧了。

說到全局與局部的關係，不但戰略與戰役的關係如此，戰役與戰術的關係也是如此。師的動作與團營動作的關係，連的動作與排班動作的關係，就是實例。任何一級首長，他的注意重心，應放在那些對於他所指揮的全局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或動作上，而不應以其他的問題或動作放在自己注意的第一位。

說重要，說有決定意義，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況去規定，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去規定，作戰時選擇突擊方向與突擊點，要按照當前的敵情地形與自己兵力的情況去規定。在給養豐富的地方注意力放在不要吃得過飽上面，給養不足的地方却在於注意不使餓肚。在白區，可以因為僅僅一個消息的走漏而使爾後的戰鬥失敗。在蘇區，則走漏消息的問題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戰役，高級指揮員有親自參加之必要，其他則無此必要。一個軍事學校，最重要的問題，是選擇校長教員與規定教育方針。一個民衆大會，主要應注意動員到會與提出口號的恰當。如此等等。總之一個原則，就是注意於那些有關全局的重要關節。

學習戰爭全局的指導規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為這種全局性的東西，眼睛看不見，只能用心思想得到的，不用心思去想，就不會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構成的，有局部經驗的人，有戰役戰術經驗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夠明白那些更高級的

東西。戰略問題，如所謂照顧敵我之間的關係，照顧各個戰役之間的關係，照顧有關全局的（有決定性的）某些部份，照顧全般情況中的特點，照顧前後方之間的關係，照顧消耗與補充，作戰與休息，集中與分散，攻擊與防禦，前進與後退，隱蔽與暴露，主攻方面與助攻方面，突擊方面與箝制方面，集中指揮與分散指揮，持久戰與速決戰，陣地戰與運動戰，本軍與友軍，這些兵種與那些兵種，上級與下級，幹部與兵員，老兵與新兵，高級幹部與低級幹部，老幹部與新幹部，蘇區與白區，老蘇區與新蘇區，中心區與邊區，熱天與冷天，勝仗與敗仗，大兵團與小兵團，正規軍與游擊隊，消滅敵人與爭取羣衆。擴大紅軍與鞏固紅軍，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軍事任務與政治任務，過去的任務與現在的任務，現在的任務與將來的任務，那種情況下的任務與這種情況下的任務，固定戰綫與非固定戰綫，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這一歷史階段與那一歷史階段，等等問題的區別與聯系，都是看不見的東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練習純熟，都可以指揮如意的。這就是說，把戰爭或作戰的一切重要與必要的問題，都提到較高的原則性上去解決，這就是研究戰略問題的任務，也就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性的任務。

四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爲什麼組織紅軍？在於使用他戰勝敵人。爲什麼學習戰爭規律，在於使用這些規律於戰爭。

學習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戰爭的學問拿在講堂上，或在書本中，儘管很多人講的頭頭是道，打起仗來却有勝負之分，戰爭史同我們的生活，都證明了這一點。

那麼，關鍵在那裏呢？

我們不能要求事實上的常勝將軍，這是從古以來就沒有的。我們要求在戰爭過程中，一般的打勝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將軍——智勇雙全的將軍。要達到這一點，有一種法子是要學的，這就是學與用的方法，學的時候使用這種方法，用的時候也使用這種方法。什麼方法呢？那就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

許多國家頒佈的軍事條令書上，都有「按照情況活用原則」的指示，又都指示了打敗仗時的處置方法。前一種是不要指揮員因死用原則而主觀地犯錯誤，後一種是當着指揮員主觀的犯了錯誤，或客觀情況起了非所預料的與不可抗的變化時，告訴我們怎樣去

處置。

爲什麼主觀上會犯錯誤呢？就是戰爭或戰鬥的部署與指揮不適合當時當地的情況，主觀的指導與客觀的實在情況之間不相融洽，不相符合，不對頭，或者叫作沒有解決主客觀之間的矛盾。人辦一切事情都難免這種情形，有比較會辦有比較不會辦之分罷了。事要求比較會辦，軍事上就要求比較多打勝仗，反面的說，要求比較少打敗仗。這裏的關鍵，就在於把主觀與客觀二者之間好好的融洽起來。

舉戰術的例子來說。攻擊點選在敵人陣地的某一翼，而那裏正是敵人的薄弱部，突擊因而成功，這叫做主觀與客觀相融洽，也就是指揮員的偵察、判斷，與決心，同敵人及其配置的實在情況相融洽。如果攻擊點選在另一翼或中央，結果正碰在敵人的釘子上，就叫做不相融洽。攻擊時機的適當，預備隊使用的不遲不早，以及各種戰鬥處置與戰鬥動作都利於我不利於敵，便是整個戰鬥中主觀指揮與客觀情況通通相融洽。通通相融洽的事，在戰爭或戰鬥中是極其少有的，這是因爲戰爭或戰鬥的雙方只集團的武裝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原故，同處理靜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是要做到大體上適合情況，即在有決定意義的部份相一致，那就是勝利的基礎了。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與必要的偵察，和對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這裏是敵方情況的各種表現，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與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材料加以去粗取精

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對比着看互相的關係，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對於建設每個戰略戰役或戰鬥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過程。粗心大意的軍事家，不去這樣做，把軍事計劃建設在一相情願的基礎上，這種計劃是空想的，不符合於實際的。魯莽的專憑熱情的軍事家之所以不免於受敵人的欺騙，受敵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況所引誘，受自己部下不負責的無真知灼見的建議所鼓動，因而不免於碰壁，就是因為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任何軍事計劃，是應該建設於必要的偵察與周密的思索敵我情況及其互相關係之上的原故。

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見之於軍事計劃建設之前，而且見之於軍事計劃建設之後。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又是一個過程，一個新的即實行的過程。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於實況，發生重新檢查的問題。如果計劃與情況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於新的情況。部份改變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戰都是有的，全部改變也是間或有的。魯莽家不知改變或不願改變，只是盲幹，結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說的是一個戰略行動，或一個戰役與戰鬥行動。經驗多的軍人，假使他是虛心學習的，他摸熟了自己部隊（指揮員、戰鬥員、武器、給養等等及其由他們構成的總體）的脾氣，又摸熟了敵人部隊（同樣，指揮員、戰鬥員、武器、給養等等，及其總體）的脾氣，摸熟了一切其他戰爭環境（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等），這樣的軍人指導

戰爭或作戰，就比較有把握，比較能打勝仗。這是在長時間戰爭中，認識了敵我雙方的情況，找出了行動的規律，解決了主觀與客觀的融洽不融洽問題。這一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一種長時間的經驗，要了解與把握整個戰爭的規律是困難的。做一個真正能幹的高級指揮員，不是僅僅善於在紙上談兵或初出茅廬的人所能辦得到的，必須在戰爭中學習才能辦得到。

一切帶原則性的軍事規律或軍事理論，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關於過去戰爭的總結。這些過去戰爭留給我們的血的教訓，應當着重的學習它，這是一件事。然而還有一件事，即是從自己經驗中考證這些結論，吸收那些用得着的東西，拒絕那些用不着的東西，創設那些自己所特有的東西。這後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這樣做，我們就不能指導戰爭。

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最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衆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幹，而是幹起來再學習，幹就是學習。從「老百姓」到軍人中間有一個距離，但不是萬里長城，而是可以迅速消滅的，幹革命，幹戰爭，就是消滅這個距離的方法。說學習與使用不容易，是所學的澈底，使用純熟。說老百姓很快可以變成軍人，是說此門並不難入。把二者總合起來，用得着中國一句老話：「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入門既不難，深造也是辦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於學習罷

了。

軍事的規律，同其他事物的規律一樣，是客觀實際對於我們頭腦的反映，除了我們的頭腦以外，一切都是客觀實際的東西。因此學習與認識的對象，包括敵我兩方面，這兩方面都應該把他看成研究的對象，只有我們的頭腦（思想）才是研究的主體。有一種人明於知己，暗於知彼；又有一種人明於知彼，暗於知己，都是不能解決戰爭規律的學習與使用的問題的。中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子書上『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那句話，是包括學習與使用兩個階段的意義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并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

戰爭——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階級與階級，政治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互相鬥爭的最高形式，一切關於他的規律，都為了爭取勝利而使用。戰爭的勝負，主要決定於雙方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不僅僅如此，還決定於主觀指導的能力。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之外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條件許可之內爭取戰爭的勝利。軍事家活動的舞台建築在客觀物質條件許可的上面，然而軍事家憑着這個舞台，却可以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在既定的客觀物質基礎即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之上，紅軍的指導者，就要發揮他們的威力，提挈全軍，去打倒那些民族的與階級的敵人，改變這個不好的世界。這裏就用得着而且必須用我們主觀指導的能力。我們不許可任何一個紅軍指戰員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我

們必須提倡每個紅軍指戰員變爲勇敢而明智的英雄的他們不但有壓倒一切的勇氣，而且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指戰員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的達到彼岸。戰爭指導規律，就是戰爭的游泳術。

以上是我們的方法論。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戰爭

自從一九二五年開始的中國革命戰爭，已經過去了兩個階段，即北伐戰爭階段與蘇維埃戰爭階段；今後則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這三個階段，已經是而且也不能不是被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首領中國共產黨所領導，或參加了這個領導。因為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敵人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中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帶買辦性與封建性的大資產階級，雖在某種歷史時機可以參加這個革命戰爭，然而由於他們的自私自利性與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不願意也不能，領導中國革命戰爭走上澈底勝利的道路。中國農民羣衆與小資產階級，是願意積極的參加革命戰爭，并願意使戰爭得到澈底勝利的，然而由於他們的小生產性，使他們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份失業羣衆則帶着無政府思想。因此他們是革命戰爭中的主力軍，但不能成為戰爭的正確的領導者。因此，在無產階級政黨已經形成的時代，戰爭的正確的領導責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國共產黨的肩上。在這

種時候，任何的革命戰爭如果沒有或違背無產階級與共產黨的領導；那個戰爭是一定失敗或不能進入徹底勝利的。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社會各階層中，只有無產階級及共產黨，才是比較最沒有狹隘性與自私自利性，比較最有遠大的政治眼光與最有組織性，而且也最能虛心接受世界先進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經驗用之於自己的事業。因此，只有無產階級與共產黨能夠領導農民，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克服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狹隘性，克服失業者羣的破壞性，并且還能夠克服資產階級的動搖與不徹底性（如果共產黨的政策不犯錯誤的話），而使革命戰爭走上勝利之路。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基本的說，是在國際與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影響與政治合作之下進行的。然而當着革命與戰爭的緊急關頭，首先由於大資產階級的叛變，同時也由於革命隊伍中機會主義者的自動放棄領導權，這次革命戰爭就因而失敗了。

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蘇維埃戰爭，是在新的情況之下進行的。戰爭的敵人不但是帝國主義，而且是大資產階級與大地主聯盟的統治。民族資產階級則做了大資產階級的尾巴。領導戰爭的，惟一的只有共產黨。共產黨的這種絕對的領導權，是使戰爭堅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條件，沒有共產黨這種絕對的領導，是不能設想戰爭能有這樣的堅持性的。

中國共產黨是英勇堅決的領導了中國的革命戰爭，在十五年的長歲月中，在全國人

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爲了保護人民的利益，爲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火綫的最前綫。

中國共產黨以自己艱苦奮鬥的經歷，以幾十萬英勇黨員與幾萬英勇幹部的流血犧牲做代價，在全民族幾萬萬人中間起了偉大的教育作用。中國共產黨的這一偉大的歷史成績，使得今天處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有了救亡圖存的前提條件——有了一個爲大多數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長期間內考驗過因此選中了的政治領導者。現在共產黨說的話，比其他任何政黨說的話，都易於爲人民所接受，沒有中國共產黨過去十五年的艱苦奮鬥，挽救新的亡國危險是不可能的。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中，除了犯過陳獨秀主義與李立三主義兩個錯誤之外，還犯過了下述的兩個錯誤：其一，是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的左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使得蘇維埃戰爭受到嚴重的損失，產生了五次圍剿不能戰勝反而喪失了蘇區削弱了紅軍的結果，這個錯誤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的遵義會議時糾正過來了。其二，是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發展到破壞了黨與紅軍的紀律，使一部份紅軍遭受嚴重的損失；然而由於中央的正確領導，紅軍中黨員與指戰員的覺悟，終於也把這個錯誤糾正過來了。所有這些錯誤對於我們的黨我們的革命與戰爭，當然是非常不利的，然而我們的黨與我們的紅軍，卻從這些錯誤中鍛鍊得更加堅強了。

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而且繼續領導轟轟烈烈光榮勝利的革命戰爭，這個戰爭不但是

解放中國的旗幟，而且是具備着國際革命的意義的，世界的革命人民都把眼睛望着我們。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上，我們將引導到中國革命的完成後也將給東方及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響。在過去的革命戰爭中證明，我們不但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線。十五年的革命與戰爭，已經鍛鍊出來這樣的政治路線與軍事路線了。今後戰爭的新階段上，我們相信將使這樣的路線根據新的環境，更加發展、充實、與豐富起來，達到戰勝民族敵人之目的。歷史告訴我們，政治的與軍事的路線，不是自然地平安地產生與發展起來的，而是從鬥爭中產生與發展起來的；一方面同左傾機會主義作鬥爭，另一方面同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不同這些危害革命戰爭的有害傾向作鬥爭，并且澈底的克服他們，正確路線的建設與革命戰爭的澈底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在這本小册子中時常提到錯誤方面的意見，就是爲了這個目的。

第三章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

一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不承認、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中國革命戰爭有其特點的人，把紅軍對國民黨軍隊的作戰，看做與一般戰爭相同，或與蘇聯內戰相同，因而採用相同的軍事指導路綫、甚至一切軍事原則，這，在我們的十年戰爭史中已完全證明其不對了。

在我們的敵人方面，也曾犯過了類似的錯誤。他們不承認同紅軍作戰須要有不同的戰略戰術，他們倚仗其各方面的優勢，輕視我們，固守其老套戰法，這是四次『圍剿』特別是三次『圍剿』以前的情形，其結果就招致了他們歷次的失敗。首先在國民黨軍隊中提出這個問題的是柳維垣，後來有戴岳，最後是被蔣介石採納了，這就是廬山軍官訓練團及其五次『圍剿』新軍事原則產生的過程。

然而當着敵人改變其軍事原則使之適合於同紅軍作戰的情況之時，我們隊伍中却出現了回到『老套』，回到一般情況，或者回到最地異國情況方面去，拒絕了解任何的特

殊情況，拒絕紅軍血戰史的經驗，輕視國民黨軍隊，對敵人採用的新原則視若無睹，結果是受了歷史的懲罰。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就不能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就不能引導中國革命戰爭走上勝利的途徑。

二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

那末，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呢？

我以為有四個主要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地大物博的國家，而又經過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

這個特點，指出中國的革命戰爭有發展與勝利的可能性。當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國游擊戰爭發生不久，井岡山的同志們中有人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這個疑問的時候，我們就把他指出來了（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會議）。因為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不答覆中國紅軍能否存在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大會，把這個問題更原則地答覆了，全國蘇維埃運動就有了正確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針。

現在把這個問題分開來看一看：

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微弱的資本主義與嚴重的半封建經濟同時存在，近乎近代式的若干工商業都市與停頓在中世紀式的廣大農村同時存在，幾百萬產業工人與幾萬萬舊制度下的農民同時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軍閥與管理各省的小軍閥同時存在，正規軍隊與雜牌軍隊同時存在，若干的鐵路航路汽車路與普通的獨輪車路，只能用脚走的路與用脚還不好走的路同時存在。

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的不統一，影響到中國統治集團間的不統一，數國支配的半殖民地國家與一國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區別的。

中國是一個大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迴旋的餘地。

中國是經過了一次大革命的——準備好了紅軍的種子，準備好了紅軍的領導者即共產黨，又準備好了參加過革命的民衆。

所以我們說，中國是一個經過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地大物博的國家，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第一個特點。從這個特點出發，不但基本地規定了我們政治上的戰略與戰術，而且也基本地規定了我們軍事上的戰略與戰術。

第二個特點是敵人的強大。

紅軍的敵人國民黨，他是怎樣一個狀況呢？他是奪取了而且相對地穩定了政權的政黨。他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國家的援助。他已改造了他的軍隊——改造得與中國任

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現代國家却大體相同，武器與物質供給比起紅軍來是特別雄厚，而且其數之多超過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代，超過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常備軍，同紅軍比較起來眞有天壤之別。他控制了全中國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的樞紐或命脈，他是全國性的政權。

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第二個特點，中國紅軍是處在這樣強大的敵人面前。從這個特點出發，使紅軍的作戰不能不與一般戰爭，蘇聯內戰，北伐戰爭都有許多的不同。

第三個特點是紅軍的弱小。

中國紅軍是產生於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之後，從游擊隊開始，不但處在中國的反動時期，而且處在世界上反動國家政治上經濟上相對穩定的時期。

蘇維埃政權是分散而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權，沒有任何的外間援助。蘇區經濟條件與文化條件同國民黨區域比較是很落後的。其區域開始是非常之小，後來也並不很大。而且蘇區是流動不定的，紅軍沒有眞正鞏固的根據地。

紅軍的數量是少的，紅軍的武器是差的，紅軍的糧食被服等物質供給是非常困難的。

這個特點與前一個特點是相反的對比，影響到紅軍的戰略戰術，是在這種相反的對比上發生的。

第四個特點是共產黨領導與土地革命。

這個特點是第一個特點的必然結果。由於這個特點，一方面，就使得中國革命戰爭雖處在中國與世界的反動時期，然而紅軍是能夠勝利的，因爲他有共產黨的領導與農民的援助。就使得紅軍雖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與龐大的國民黨政權相對立，軍事上給了國民黨的進攻以很大的困難，因爲有農民的援助。就使得紅軍雖小却有強大的戰鬥力，因爲紅軍人員是從土地革命產生爲着自己的利益而戰鬥的，而且指揮員與戰鬥員之間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則與國民黨成了相反的對比，國民黨是反對土地革命的，因此沒有農民的援助。其軍隊雖多，却不能使士兵羣衆及許多小生產者出身的下級幹部自覺地爲國民黨拼命，官兵之間在政治上是分歧的，減少了他的戰鬥力。

三、由此產生我們的戰略戰術

經過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經濟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強大的敵人，弱小的紅軍，土地革命——這是中國革命戰爭四個主要的特點，從這些特點出發，就規定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路綫及其許多戰略戰術的原則。從第一個特點與第四個特點出發，就給了中國紅軍以發展與戰勝其敵人的可能性。從第二個特點與第三個特點出發，就給了中國紅軍以不能很快發展與不能很快戰勝其敵人的可能性，即是給了戰略持久戰的可能性，而

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話，就有失敗的可能性。

這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兩方面。這兩方面同時存在着，即是說在順利的條件下又有他的困難條件。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許多規律都從這個根本的規律發生出來。十年戰爭史證明了這個規律的正確性。誰要是睜眼看不見這些特點，看不見這些特點發生的兩方面根本性質的規律，誰就不能指導中國的革命戰爭，誰就不能使紅軍打勝仗。

很明顯的，正確的規定戰略方向，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禦時反對保守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要反對紅軍的游擊主義，却又要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反對戰役的持久戰與戰略的速決戰，承認戰略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反對固定的作戰綫和陣地戰，承認非固定的作戰綫和運動戰；反對擊潰戰，承認消滅戰；反對戰略方向的兩個拳頭主義，承認一個拳頭主義，反對大後方制度，承認小後方制度；反對絕對的集中指揮，承認相對的集中指揮；反對單純軍事觀點與流寇主義，承認紅軍是蘇維埃的宣傳者與組織者，反對土匪主義，承認嚴肅的政治紀律；反對軍閥主義，承認有限制的民主生活與有威權的軍事紀律，反對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承認正確的幹部政策；反對孤立政策，承認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後，反對把紅軍停頓於舊階段，爭取紅軍發展到新階段。所有這些原則問題，都從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及其根本規律出發而要求正確的解決，或從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及其根本規律出發，而有特別值得注意的意義。我

們現在要講的戰略問題，就是要求中國革命戰爭十年血戰史的經驗，好好的說明這些問題。

第四章　圍剿與反圍剿

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形式

十年來，從游擊戰爭開始的一天起，任何一個獨立的游擊隊或紅軍的周圍，任何一個蘇維埃根據地的周圍，經常遇到的是敵人的圍剿，敵人把紅軍看作異物，一出現就想把他捕獲，敵人總是跟着紅軍，而且總是把紅軍圍起來。這種形式，過去十年是沒有變化的，如果沒有民族戰爭代替國內戰爭，那末，直到敵人變成弱小者紅軍變成強大者那一天爲止，這種形式也不會變化的。

紅軍的活動，是採取了反圍剿的形式。所謂勝利，主要的是說反圍剿的勝利，這就是戰略與戰役的勝利。反對一次圍剿是一個戰役，常常由大小數個以至數十個戰鬥組織而成，在一次圍剿沒有基本的被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許多戰鬥的勝利，還不能說戰略上或整個戰役上已經勝利了。十年的紅軍戰爭史，就是一部反圍剿史。

敵人的圍剿與紅軍的反圍剿，互相採用進攻與防禦這兩種戰鬥形式，這是同古今中

外的戰爭沒有兩樣的。然而中國內戰的特點，則在二者長期的反復。在一次圍剿中，敵人以進攻反對紅軍的防禦，紅軍以防禦反對敵人的進攻，這是反圍剿戰役的第一個階段。敵人以防禦反對紅軍的進攻，紅軍以進攻反對敵人的防禦，這是反圍剿戰役的第二個階段。任何的圍剿，都是包括這兩個階段的，而且是長期反復的。

說長期反復，是說戰爭及戰鬥形式的反復，這是事實，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圍剿反圍剿是戰爭形式的反復。敵以進攻對我防禦，我以防禦對敵進攻的第一階段，與敵以防禦對我進攻我以進攻對敵防禦的第二階段，是每一圍剿中戰鬥形式的反復。

至於戰爭與戰鬥的內容，則不是簡單反復的，而是每次不同的，這也是事實，任何人一看就知的。

這裏的規則，是圍剿反圍剿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情況一次比一次複雜，戰鬥一次比一次激烈。

然而這是沒有起落的，五次圍剿之後，因爲紅軍相對地削弱了，根據地的位置移到了西北，也不是處在威脅中國主要敵人的最重要地位了，圍剿的規模，情況與戰鬥，就比較小些，簡單些，緩和些了。

紅軍的失敗是什麼呢？在戰略上說，只有反圍剿根本沒有成功，才叫做失敗，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與暫時的失敗，因爲國內戰爭根本的失敗，就是整個紅軍的覆滅，然而這樣的事實在我們是沒有的。蘇區的喪失與紅軍的轉移，這是暫時與局部的失敗，這

種事實，我們把他叫做防禦的繼續。而把敵人的追擊叫做進攻的繼續。這就是說，在圍剿與反圍剿的鬥爭中，我們沒有由防禦轉到進攻，反被敵人的進攻打破了我們的防禦，我們的防禦就變成了退却，敵人的進攻就變成了追擊。然而等到紅軍到達一個新地區時，圍剿反復又出現了。所以我們說，紅軍的戰略退却（長征）是紅軍戰略防禦的繼續，敵人的戰略追擊是敵人戰略進攻的繼續。

中國國內戰爭同任何古今中外的戰爭一樣，基本的戰鬥形式只有攻防兩種，中國內戰的特點，是圍剿反圍剿的長期反復，與攻防兩種的長期反復，並且包括着偉大的戰略轉移這一種東西在裏面。

所謂敵人的失敗，也是如此。他們的戰略失敗，就是他們的圍剿被我們打破，我們的防禦變成了進攻，敵人轉到防禦地位，必須重新組織才有再一次的圍剿。敵人沒有如同我們所謂戰略轉移（長征）的那種情形，乃因他們是全國性的統治者，他們比我們特別強大的原故。然而部份的事情是有過的，若干蘇區中的白色據點內被紅軍圍攻的敵人突圍而出，退却到白區裏去重新組織進攻，是發生過的。如果內戰延長，紅軍勝利的範圍更廣大時，這種事情會多起來。但他們的結果不能同紅軍相比，因爲他們沒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間又不一致，他們如果也學紅軍的長途轉移，那是難保不被消滅的。

李立三不懂得中國內戰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國內戰發展中圍剿又圍剿、打破又打破的這種長期反復的規律（那時已有井岡山的三次圍剿，福建的兩次圍剿等），命令

紅軍去打武漢，命令全國暴動，企圖革命迅速勝利，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一九三二年的左傾機會主義，也不相信圍剿反復這一規律。在鄂豫皖則有「偏師」說，承認三次圍剿失敗後的國民黨不過是偏師了，要進攻紅軍，就是帝國主義親身担當主力軍。在這個估計之下的戰略方針，就是紅軍打武漢。這和中央蘇區的號召紅軍打南昌，反對蘇區聯成一片的工作，反對『東北路線』，反對誘敵深入的作戰，把一省勝利放在奪取省城與中心城市的基點上，以及認五次圍剿是蘇維埃道路與國民黨道路的决戰等等，是原則上一致的。這個左傾機會主義，種下了鄂豫皖反對四次圍剿，中央蘇區反對五次圍剿鬥爭中錯誤路線的根苗，在敵人嚴重的圍剿面前不得不處於無能的地位，給了中國蘇維埃運動以很大的損失。

跟否認圍剿反復的左傾主義直接聯系，而說紅軍根本不應該採取防禦手段的一種意見，也是完全不正確的。

革命與革命戰爭是進攻的——這是正確的說法。革命與革命戰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沒發生到發展，從沒有政權到奪去政權，從沒有紅軍到創造紅軍，從沒有蘇區到創造蘇區，是一天也不能保守的，保守主義的傾向是應該反對的。

革命與革命戰爭是進攻的，但也是有防禦與後退的——這更是正確的說法。為了進攻的防禦，為了前進的後退，為了向正面而向側面，為了走直路而走彎路，是任何事情的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何況軍事運動？

但前一論斷，在政治上說來，是對的，移到軍事上就不對了。從政治上某一種情況說來（革命前進時）是對的，假如移到另一種情況（革命退却時，全部退却例如俄國一九〇六年，中國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國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條約時）也就不對了。只有後一論斷，才是全部正確的眞理。一九三二年的左傾機會主義，機械的反對軍事的防禦手段，僅是一種非常幼稚的思想。

圍剿反復的形式何時結束？照我的意見，如果內戰延長的話，那是在敵我強弱對比起了根本變化之時。如果蘇維埃紅軍一旦改變到比自己的敵人更爲強大時，那末，這個反復就結束了。那時是我們圍剿敵人，敵人則企圖反圍剿，但政治軍事的條件將不允許敵人採取如同紅軍一樣的反圍剿的地位。那時，圍剿反復這樣形式，即使不說完全結束，但一般的結束是可以斷言的。

第五章　戰略防禦

這個題目中，我想說明下列各問題：（一）積極防禦與消極防禦；（二）反圍剿的準備；（三）戰略退却；（四）戰略反攻；（五）反攻開始問題；（六）集中兵力問題；（七）運動戰；（八）速決戰；（九）殲滅戰。

一　積極防禦與消極防禦

為什麼從防禦說起呢？中國第一次民族統一戰綫失敗後，革命進到了深刻的階級戰爭，敵人是大政權，我們是小部隊，因此我們一開始就是和敵人的圍剿奮鬥，我們的進攻是密切聯系於打破圍剿，我們發展的命運全看我們能不能打破圍剿。打破圍剿的過程往往是迂迴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首先而且嚴重的問題，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機破敵，所以戰略防禦問題成為紅軍作戰中最複雜最重要的問題。

在我們的十年中，對於戰略防禦問題，常常發生兩種偏向，一種是輕視敵人，又一種是為敵人所嚇倒。

由於輕視敵人而來的結果，我們看見許多游擊隊的失敗，紅軍若干次圍剿之不能打破。

游擊隊初起，領導者對於敵我形勢看得不正確，看見自己在一地方用突然的暴動勝利了，或從白軍中譁變出來了，一時的順利環境，或對嚴重環境看不到，往往輕視敵人。另一方面，對自己的弱點（沒有經驗，力量弱小等），也不了解，因而把行動引向錯誤的道路，精神上解除了防禦的武器，許多游擊隊因此失敗了。

紅軍因爲這種原因不能打破圍剿的例子，則有一九二八年海陸豐的紅軍，因爲輕敵而招來了失敗。有一九三二年鄂豫皖紅軍，在所謂國民黨的偏師說之下，使得反對四次圍剿喪失了持久裕如的能力。

爲敵人嚇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從與前者相反的立場出發，太看重了敵人，太看輕了自己，因而採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政策，精神上同樣解除了防禦的武器，結果或使游擊隊失敗，或使紅軍的某些戰役失敗，或使蘇區歸於喪失。

關於喪失蘇區最顯著者，是五次圍剿中的中蘇區，這裏的錯誤是從右傾的觀點產生的，然而這錯誤，往往有一種左傾輕敵的錯誤爲之先行，一九三二年進攻中心城市的軍事冒險主義，不能不是後來五次圍剿中消極防禦路線的根源。

爲敵人嚇倒極端的例子，是退却主義的「張國燾路線」，西路軍在河西的失敗，是

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

積極防禦，又叫攻勢防禦，又叫決戰防禦。消極防禦，又叫專守防禦，又叫單純防禦。消極防禦實際上是假防禦，只有積極防禦才是真防禦，才是為了反攻與進攻的防禦。據我知道的，任何一本有價值的軍事書，任何一個比較聰明的軍事家，而且無論古今與中外，無論戰略與戰術，沒有不反對消極防禦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極防禦當法寶。然而世上偏有這樣的人，做出這樣的事，這是戰爭史中一種過失，是保守主義在軍事上的表現，我們是應該根本反對的。

後起而且發展很快的帝國主義國家，以德日兩國為代表的軍事家中，積極鼓吹戰略進攻的利益，反對戰略防禦，這個原則，是根本不合於中國蘇維埃戰爭的，也不合於中國的民族戰爭。他們指出防禦的一個重要弱點是不能振奮人心，反使人心動搖，這是說的階級矛盾劇烈，而戰爭的利益僅僅屬於統治階層乃至當權政派的那種國家，對於我們的蘇維埃戰爭與民族戰爭，則是根本相反的。在保衛蘇區與保衛中國的口號下，能夠團結最大多數人民萬眾一心的作戰；因為我們是被壓迫與被侵略者。蘇聯內戰也是在防禦形式之下戰勝敵人的，他們不但在帝國主義各國組織白黨進攻時，戰爭的進行是在保衛蘇維埃的口號下，就是在十月暴動的準備時期，也是在保衛首都的口號下進行軍事動員的。一切戰略的防禦，不但有麻痺政治上異己份子的作用，主要的是能夠動員落後的人民群眾加入戰爭中來。

馬克思說的暴動之後一刻也不應該停止進攻，這是說的乘敵不備而突然暴動起來的羣衆，應該不讓統治者有保守政權或恢復政權的機會，趁此一瞬間把國內統治勢力消滅個澈底，這是完全正確的，然而不是說，雙方已在軍事對抗中，而且敵人是優勢者，當受敵人壓迫時，不應該採取防禦手段。如果這樣想，那就是第一號的傻子。

我們過去的戰爭，整個的是向國民黨進攻，然而在軍事上採取了打破圍剿的形式。

在軍事上說來，我們是防禦與進攻的反復應用。對於我們，說進攻是在防禦之後，或說進攻是在防禦之前都是可以的，因為關鍵在於圍剿之打破。圍剿沒有打破以前是防禦，圍剿一經打破就開始了進攻，僅僅是一件事情的兩個階段，而一次圍剿與又一次圍剿是啣接着的。這兩個階段中，最複雜最重要的階段，是防禦的階段，包含着怎樣打破圍剿的許多問題。基本的原則是承認積極防禦，反對消極防禦。

從國內戰爭說，假如紅軍的力量超過了敵人時，那末一般的就用不着戰略防禦了，那時的方針基本的只是戰略的進攻，種種改變完全依靠於總的敵我力量的變動。防禦到了那時，剩下的是局部的防禦，總的方針就沒有戰略進攻不行，甚至佔着比較重要地位，如同現在一樣的戰略防禦這種東西了。

二　反圍剿的準備

對於敵人的一次有計劃的圍剿，如果我們沒有充分的與必要的準備，必然陷入被動地位，臨時倉卒應戰，勝利的把握是沒有的，因此在與敵人準備圍剿，同時進行我們的反圍剿準備，實有完全的必要，反對準備的意見是幼稚可笑的。

這裏有一個困難問題，也就容易發生爭論。就是，何時結束自己的進攻、轉入反圍剿的準備階段呢？因為此時自己是處在勝利的進攻中，敵人處在防禦地位，敵人的圍剿準備是在秘密地進行的，難於知道他們將在何時開始進攻。我們準備反圍剿的工作開始早了，不免減少進攻的利益，而且有時會給予紅軍與蘇維埃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響。因為準備階段中的主要步驟，就是軍事上的準備退却，政治上的動員。有時會因過早準備，變為了等待敵人，等了好久而敵人未來，不得不重新發動自己的進攻。有時或因我們的重新進攻剛在開始，又恰好過到了敵人進攻的開始，把自己處在困難地位。所以開始準備時機的選擇，成為一個重要問題。斷定這種時機，要從敵我雙方情況及二者間的關係着眼。敵人的情況，須從敵人方面的政治軍事財政及社會輿論等各方面搜集材料。分析這些材料的時候，要足夠的估計敵人的整個力量；不可誇大敵人過去失敗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估計到敵人營壘間的矛盾，財政的困難，過去失敗的影響等等。自己方面，

不可誇大過去勝利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足夠的估計到過去勝利及於敵人的影響。

但開始準備的時機問題，一般說來，與其失之過遲，不如失之過早，因爲後者的損失較之前者爲小，而其利益，則在有備無患，根本上立於不敗之地。

準備階段中主要的問題，是紅軍的準備退却，政治動員，擴大紅軍，財政粮食，政治異己份子的處置等。

所謂紅軍準備退却，就是說不要使紅軍向着不利於退却的方向，不要進攻得太遠了，不要使紅軍過於疲勞。這是敵人大舉進攻的前夜主力紅軍的必要的處置。這時候紅軍的注意力，主要的要放在創造戰場，徵集資材，擴大自己與訓練自己的計劃上。

政治動員是反圍剿鬥爭中第一個重要問題。這即是說，明確、堅決而充分的告訴紅軍人員與蘇區人民：關於敵人進攻的必然性與迫切性，敵人進攻危害蘇維埃與人民的嚴重性。同時，敵人的弱點，紅軍與蘇區的優良條件，我們一定要勝利的志願，我們工作的方向等，號召紅軍與人民全體爲反對圍剿保衛蘇區而鬥爭。除開軍事秘密之外，政治動員是必須公開的，而且力求普及於每一個可能擁護蘇維埃利益的人員。重要的關節是動員幹部。

擴大紅軍須從兩方面出發：一方面顧到蘇區人民政治的覺悟程度及人口情況。又一方面顧到當時紅軍的情況及整個反圍剿戰役中紅軍消耗的可能限度。

財政粮食問題，不待說對於反對圍剿是有決定意義的，要顧及圍剿時間的可能延長

。主要的是紅軍，再則蘇區的人民，在整個反圍剿鬥爭中物質需要的最低限度。

對待政治異己份子，不可對他們不警戒。但也不可過於恐懼他們的叛變，而採取過分的警戒手段。對地主、商人、富農之間是應該有分別的，主要的是政治上向他們說明，爭取他們的中立，民衆監視他們。只有極少數最帶危險性的份子，才可以採用嚴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圍剿鬥爭勝利的程度，是與準備階段中任務完成的程度，密切聯系的，由輕敵而發生的對於準備的放鬆，與由嚇倒於敵人進攻而發生的驚惶失措，都是應該堅決反對的不良傾向。我們需要的是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

三 戰略退却

戰略退却，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爲顧及到不能立即擊破其進攻，爲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採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可是軍事冒險主義，則堅決反對此種步驟，他們的主張是禦敵於國門之外。對於這種主張，過去曾發生過激烈的爭論，而且直到經過長久歲月，證明這種主張是嚴重地危害着蘇維埃戰爭時，才把他打翻。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闢頭

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往往退讓者打倒其勢洶洶者。

水滸傳上的王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冲，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冲看出王教頭破綻，一脚踢翻了王教頭。

春秋時候，魯與齊戰，魯軍不待齊軍疲憊就要出戰，被他的軍師曹劌阻止了，採取了『敵疲我打』的方針，打勝了齊軍，成了中國戰史中弱者對強者作戰的有名的實證。今將左丘明敘述那個戰役的文章全部抄在下面：

『春，齊師伐我（魯國），公（魯莊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不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衣食所安，不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信。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古人鳴鼓進軍）。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追擊）。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克之。』

當時的情況是大國進攻小國。文中指出了戰前的政治準備——取信於民，敘述了利於轉入反攻的陣地——長勺，敘述了利於開始反攻的時機——彼竭我盈之時，敘述了追

擊開始的時機——轍亂旗靡之時。雖然是一個不大的戰役，却同時是說的戰略防禦的原則。中國戰史中合此原則因而取勝的實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漢成皋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蜀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肥水之戰，等等有名的大戰，不勝枚舉，都是強弱不本，弱者先讓一步，後發制人，因而戰勝的。

拿破崙舉三十萬大兵進攻俄國，俄國政府聽從了主張「放棄幷燒燬莫斯科京城然後再打」的軍事家的意見，拒絕了「京城怎麼好放棄更怎麼好燒燬」的許多庸俗的軍事家與政治家的意見，陷拿破崙於飢疲困苦、後路被擾亂，軍隊被包圍的絕境，不得不引退，俄軍乘機反攻，拿破崙僅剩五萬人逃去，成了拿破崙一生中空前的大敗仗，也是世界戰史上有名的大敗仗。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歐戰時，法國開始企圖禦敵於國門之外，集中大軍於德法交界。及見德軍不走此路，又倉卒轉移至法比交界。一戰失敗後，才斷然改變方針，大舉向巴黎退却，盡棄北部工業與農業區。然而這個偉大的戰略退却確是非常正確的，幹這件事是要有非常的決心與毅力才行的。雖然德國以僅僅一星期的時間，以近百萬的大軍，長驅直迫巴黎郊外，然而德軍却疲勞了，兵力也減損了，軍心也放肆了，戰綫也延長了。法軍則縮短了防綫，增加了兵力，激怒了人心。兩軍強弱的對比，因此起了變化。法國於是集中主力於巴黎西北部，包圍德軍右翼，一戰而勝，把稱雄一世的德軍打退到法國北部，不得不改取守勢，給了整個戰爭以決定的影響。這是最近代的一個最有名

的大戰。

就是在歐戰中，而且與上述西戰場的作戰同時，還有一個德軍打勝俄軍的戰役，也是鼎鼎有名的大戰，這即是東普魯士戰役。當德軍悉力於西戰場時，俄軍以出於德國意料之外的速度，集中了大軍，乘虛攻入東普魯士，長驅直進，柏林震動。興登堡收集不滿十萬的軍隊，連同西戰場調回的一部份在內，在優劣懸殊的力量對比之下，當俄軍的兩個縱隊分路銳進之時，且進入了困難的地形條件（池沼地帶）之時，集中主力擊破其左路，俘虜九萬餘人，俄軍右路倉惶退卻，興登堡以此聲震世界。

上述古代的，中世的，近代的許多例子，證明處於被攻地位我弱敵強的軍隊，在戰爭或戰役的開始階段中，不得不採取戰略防禦方針，等候有利時機轉入反攻。因爲只有這種方針，才能取得勝利，不然則是必敗之路。

我們的戰爭是從一九二七年秋天開始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南昌暴動廣州暴動是失敗了。秋收暴動在湘鄂贛邊界地區的部隊，也打了幾個敗仗，轉移到井岡山。第二年五月，南昌暴動失敗後保存的部隊，經過湘南游擊戰爭也轉到了井岡山。然而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着樸素性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據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個十六字訣的軍事原則，立三路綫以前中央是承認了的，而且發佈到了全國。後來我們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了中央蘇區第一次圍剿時，「誘敵深入」的原則被提出來了，而且應用成功了

，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於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這時是軍事原則的新發展階段，內容大大豐富起來，形式也有了許多改變，主要的是從前的樸素性不見了，然而基本的原則，仍然是那個十六字訣。十六字訣包含了反圍剿的基本原則，包含了戰略防禦與戰略進攻的兩個階段，在防禦時又包含了戰略退却與戰略反攻的兩個階段。後來的東西只是他的發展吧了。

然而從一九三二年一月開始，在黨的『三次圍剿被粉碎後爭取一省幾省首先勝利』那個包含着嚴重原則錯誤的決議案發佈之後，就向着正確的原則作鬥爭，最後是撤消了這個正確的原則，成立了一整套與此相反的所謂『新原則』，或『正規原則』。從此以後，從前的東西不能叫做正規的了，那是應該否定的『游擊主義』。反『游擊主義』的空氣，統治了整整的三個年頭。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後第三個階段變成逃跑主義。直到黨的政治局會議在一九三五年一月舉行於貴州的遵義時，才宣告這個錯誤原則的破產，重新承認過去原則的正確性。這是費了很大的代價得來的。

反游擊主義者說：誘敵深入是不對的，放棄了許多蘇區，過去雖然打過勝仗，然而現在不是不同了嗎？并且不放棄土地又能打勝敵人不更好嗎？在白區或在蘇區白區交界去打勝敵人不更好嗎？這裏沒有任何的正規性，只是游擊隊使用的辦法，現在蘇維埃國家成立了，我們的紅軍正規化了。我們同蔣介石是國家與國家作戰，大軍與大軍作戰，

歷史不應重複。游擊主義的東西是應該全部拋棄的了。新的原則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過去的東西是游擊隊在山裏產生的，山裏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新原則與此相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果敢，乘勝直追』、『全線出擊』，『奪取中心城市』，『兩個拳頭打人』。敵人進攻時，對付的辦法，是『禦敵於國門之外』，是『先發制人』，『不打爛罈罈罐罐』，『不喪失寸土』，『六路分兵』，『反對五次圍剿是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的決戰』，是『堡壘戰』，是『消耗戰』，是『持久戰』，是『大後方主義』，是『絕對集中指揮』，是『短促突擊』，最後，則是大規模『搬家』，並且誰不承認這些新原則，就給他以懲辦主義，加之以機會主義頭銜，如此等等。

無疑的，這全部的理論都是錯了的。這是機械論，這是環境順利時小資產階級革命狂熱與革命急性病的表現，環境困難時，則依照情況的變化以次變爲拚命主義，保守主義，與逃跑主義，是魯莽家與門外漢的理論與實際，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這裏單說戰略退却。中央蘇區叫做『誘敵深入』，四川蘇區叫做『收緊陣地』，從前的軍事理論家與實際家也無不承認這是弱軍對於強軍作戰，在戰爭開始階段必須採取的原則。歐美日本的軍事家就這樣說：『戰略守勢之作戰，大都先避不利之決戰，使至有利之情況始求決戰』，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對此也沒有任何的增加。

戰略退却之目的是爲了保存軍力，準備反攻，保存軍力之所以必要，是因爲處在強

敵的進攻面前，若不退讓一步，則必危及軍力之保存。過去卻有許多人堅決的反對退卻，認為這是「機會主義的單純防禦路線」，我們的歷史業已證明這個反對是完全錯誤的了。

準備反攻，須選擇及造成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若干條件，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然後進入反攻階段。

依我們的過去情形說來，大概須在退卻階段中獲得下列條件中至少二種以上，才算有利於我不利於敵，才好使自己轉入反攻。這些條件是：

(一)積極援助紅軍的人民；

(二)作戰有利的陣地；

(三)紅軍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發現敵人的薄弱部份；

(五)使敵人疲勞沮喪；

(六)使敵人發生過失。

人民條件，對於紅軍是最重要的條件，這就是蘇區條件。並且由於這個條件，使第四，第五，第六等條件也容易造成或發現。所以當敵人大舉進攻紅軍時，紅軍總是從白區退卻到蘇區來，因為蘇區人民最積極地援助紅軍反對白軍的。蘇區中邊區與中心區，也有區別，對於封鎖消息、偵察、運輸、參戰等事，中心區的人民比較邊區為好。所以

『退却終點』之選擇，過去中央蘇區一二三次圍剿時，都選在人民最好或較好的地區。由於蘇區這個特點，使紅軍作戰比一般作戰起了很大的變化。是使後來敵人不得不採取堡壘主義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軍隊能夠選擇自己所欲之有利陣地，使進攻軍隊不得不就我範圍，這是內線作戰的一個優良條件，弱軍要戰勝強軍，是不能不講求這個條件的。但是單有這個條件還不夠，還要求別的條件與之配合，首先是人民條件。再則還要求好打之敵，例如敵人疲勞了，或者發生過失，或者該路前進之軍比較缺乏戰鬥力。這些條件不具備時，雖有優良陣地，也只得置之不顧，繼續退却，以就自己所欲之條件、白區未嘗無優良之陣地，但無優良之人民條件，如果其他條件也還未造成或未發現時，便不得不向蘇區退却。蘇區中邊區與中心區的分別也大體是如此。

除地方部隊與牽制兵力外，一切突擊兵力以全部集中爲原則。然而當着我們向戰略上取守勢的敵人進攻時，紅軍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敵人大舉向我進攻，紅軍採取所謂『求心退却』，退却的終點，往往選在蘇區的中部。但有時也在前部，有時則在後部，這是依照情況來決定的。這種求心退却能夠使全部紅軍主力完全集中起來。

弱軍對於強軍作戰再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揀弱的打。然而當敵人開始進攻時，往往不知敵之分路各軍，何部最強，何部次強，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個偵察的過程，往往需要許多時間，才能達此目的。戰略退却之所以必要，這也是一個理由。

如果進攻之敵數量與強度都超過我軍甚遠，要求強弱的對比發生變化，便只有使之深入蘇區，吃盡蘇區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圍剿時蔣介石某旅參謀長所說的：『胖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圍剿軍西路總司令陳銘樞所說的：『國軍處處黑暗，紅軍處處明亮』之時，才能達到目的。這種時候，敵軍雖強，也大大減弱了，兵力疲勞，志氣沮喪，許多弱點暴露出來。紅軍雖弱，卻養精蓄銳，以逸待勞。此時雙方對比，往往能得出某種程度的均衡，或者敵軍的絕對優勢改變到相對優勢，我軍的絕對劣勢改變到相對劣勢，甚至有使敵軍劣於我軍，而我軍反優於敵軍的事情。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紅軍是一種極端的退卻（紅軍集中於蘇區後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因為當時的圍剿軍超過紅軍十倍以上。孫子說的『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就是指的使敵疲勞沮喪，以求減殺其優勢。

退卻以求有利形勢的最後一個要求條件，是造成及發現敵人的過失。須知任何高明的敵軍指揮員，在相當長時間中，求不發生一點過失，是不可能的，乘敵之隙之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如我們自己有時也弄錯，有時也授敵以可乘之隙，是一樣的。而且我們可以人工地造成敵人之過失，例如孫子所謂『示形』之類（示形於東而擊於西，即所謂聲東擊西）。要這樣做，退卻的終點，不能限定於某地區，有時退到該地區還無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一步，待敵發生可乘之『隙』。

退卻以求有利條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說，須待這些條件完全具備方能舉行

反攻，要同時具備這些條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但依據敵人當前形勢，爭取若干必要條件，是強弱懸殊的內線作戰軍隊所應該注意的，在這上面發生反對的意見是不正確的。

決定退卻終點究在何處，須以整個形勢作出發點。在局部形勢看來有利於我轉入反攻的，據此決定退卻終點，如果不同時也於全體形勢有利時，則是不正確的。因為反攻的開始，必須計算到以後的變化，而我們的反攻總是從局部開始的。有時退卻終點應該選在蘇區的前部，例如中央蘇區第二第四次圍剿時，陝甘第三次圍剿時，有時須在蘇區的中部，例如中區第一次圍剿時。有時則在蘇區的後部，例如中區第三次圍剿。這些都是將局部形勢聯系到整個形勢來決定的。中區第五次圍剿，我軍全然不講退卻原因，對於局部形勢與整個形勢都不注意，實在是一種魯莽滅裂的辦法。形勢是由條件造成的，觀察局部形勢與整個形勢的聯系，應從當時敵我雙方所具條件之見於局部者與見於全體者，是否在一定之限度上利於我之開始反攻以為斷。

退卻終點，在蘇區可以大體上分為前部中部後部三種。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絕在白區作戰呢？不是的。我們拒絕在白區作戰，僅僅指的對付敵軍大規模圍剿，敵我強弱不不，在保存軍力待機破敵的原則下，主張向蘇區退卻，主張誘敵深入，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造成或發現有利於反攻的條件。如果情況並不這樣嚴重，或者情況的嚴重性簡直使紅軍連在蘇區也無法開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須要再退以求局勢之變化時，那末，把退卻終

點還在白區也是應該承認的，至少是理論上應該承認的，雖然我們過去很少這種經驗。

白區退却終點大體上也可分為三種，第一是在蘇區前面，第二在蘇區側面，第三在蘇區後面。第一種終點，例如中區第一次圍剿時，如果紅軍沒有內部不統一與地方黨的分裂，即立三路線與AB團兩個困難問題存在，是可以設想在吉安南豐樟樹三點之間集中兵力舉行反攻的。因為當時從贛撫兩河間前進的敵人軍力，比起紅軍來優勢幷不很大（十萬對四萬），人民條件雖不如蘇區，但陣地條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敵分路前進去各個把他擊破的。第二種終點，例如中區第三次圍剿時，假如當時敵人進攻的規模沒有那樣大，而敵有一路從建、黎、泰進，這一路在其力量上又適合於我們打他時，也可以設想紅軍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區集中，首先打破此敵。不必繞道千里走瑞金到興國。第三種終點，同樣例如上述中區第三次圍剿時，假如敵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們也許被迫着退到會、尋、安地區（那裏是白色地區），引敵更向南進，然後紅軍由南而北向蘇區內部打去，這時北面蘇區內部敵之軍力當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這些說明都是假定，沒有經驗，可以作為特殊的東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則看待。對於我們，當敵舉行大規模圍剿時，一般的原則是誘敵深入，是退却到蘇區作戰，因為這是使我們最有把握地打破敵人的進攻的。

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意見，反對戰略退却，理由是退却要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謂「打爛罈罈罐罐」），對外也產生不良影響。在五次圍剿中，則謂我退一步，敵之

堡壘推進一步，蘇區日蹙而無法恢復，如果說誘敵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壘主義的五次圍剿是無用的，對付五次圍剿，只能分兵抵禦與短促突擊。

回答這些意見是容易的，我們的歷史已經回答了。關於喪失土地問題，是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原則。如果我們的喪失是土地，而其取得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市場交易，買者如果不喪失金錢，就不能取得貨物，賣者如果不喪失貨物，也不能取得金錢。革命運動的喪失是破壞，而其取得是進步的建設，睡眠與休息的喪失是時間，而其取得是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麼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這乃是失本生意。五次圍剿的失本正在這一點，不願意喪失一部份土地，結果喪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亞的打硬仗，也得到喪失全國的結果，雖然該國失敗的原因不僅僅這一點。

危害人民的問題同此道理，不在一部份人民家中一時的打爛些罈罈罐罐，就要使全體人民永遠的打爛罈罈罐罐。懼怕一時的不良政治影響，就要以永久的不良影響做代價。如果依照俄國左派共產主義的意見，始終拒絕對德和約時，今天的蘇聯也就沒有了。

這樣看起來好像革命的左傾意見，來源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急燥病，同時也是農民小生產者的局部保守性。他們看問題僅從一局部出發，沒有能力通觀全局，不願把今天的利益同明天的利益相聯結，把部份利益與全體利益相聯結，撅倒一局部一時間的東西

死也不放。對的，一切依照當時具體情況看來對於當時的全局與全時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決定意義的一局部與一時間，是應該掀倒不放的，不然我們就變成自流主義或放任主義。退却要有終點，就是這個道理。然而這絕不是小生產者的近視病，我們是應該學習布爾什維克的聰明的。我們的眼力不夠，應該借助於望遠鏡與顯微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與顯微鏡。

當然，戰略退卻是有困難的，退卻開始時機的選擇，退卻終點的選擇，政治上說服幹部與人民，都是困難問題，而必須給予解決的。

退卻開始時機的問題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不但法軍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開始的退卻，是時機決擇的恰到好處，成為後來反攻勝利的第一個先決條件，是一個可佩服的英斷。就是我們中央蘇區第一次圍剿時的退卻，如果不恰在那種時機，即是說如果再遲時，那我們勝利的程度至少是要受到影響的。退却過早與過遲，當然都有損失。但一般說來，過遲的損失是較之過早為大的。及時退却，對於到達退却終點以後，整頓態勢，以逸待勞地轉入反攻，只給予着極大的影響。中央蘇區的一、二、四次戰爭，都從容不迫地對付了敵人。惟獨第三次戰爭，因為不料敵人經過第二次戰爭那麼慘敗之後，新的進攻來得那麼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我們結束二次圍剿，七月一日蔣介石就開始了三次圍剿），紅軍倉卒地繞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勞。如何選擇這個時機，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從敵我雙方大勢上去判斷，和前面說過的選擇準備階段的開始時機所用

的方法是一樣的。

戰略退却，在沒有經驗時，說服幹部與人民的問題，當軍事的領導還沒有達到對戰略退却這樣的問題可以而且應該集中到最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手裏而爲幹部所承認時，困難問題就發生了。由於幹部沒有經驗，對於戰略退却的不相信，在第一次還有第四次圍剿的初期，第五次圍剿的整期，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難。第一次圍剿是立三路線的影響，幹部的意見，在沒有說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進攻。第四次圍剿是軍事冒險主義的影響，幹部的意見是反對準備。第五次圍剿開頭是繼續冒險主義反對誘敵深入的觀點，後來是變成了保守主義。張國燾主義不相信番人與回人地區不能建立我們的根據地，而待碰壁以後方才相信，也是具體的實例。經驗對於幹部是必須的，失敗確實是成功之母。但虛心接受自己以前的別人的經驗也屬必須，如果樣樣要待自己經驗，否則固執己見拒不接受，這是十足的『狹隘經驗論』，蘇維埃戰爭吃這種虧是不少的。

由於人民沒有經驗而不相信戰略退却之必要，莫過於中區第一次圍剿之時，當時吉安與國永豐等縣的地方黨及人民羣衆無不反對紅軍的退却。但在有了這一次經驗之後，在後來的幾次大圍剿時，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了。大家相信，蘇區的損失，人民的吃苦，是暫時的，大家都有了紅軍能夠打破圍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與否，密切聯系於幹部，因此主要的與首先的問題，在於說服幹部。

戰略退却全部的作用，在於轉入反攻，戰略退却僅是戰略防禦的第一階段。隨之而來，而且是全戰略的決定關鍵，在於反攻階段之能不能取勝。

四　戰略反攻

戰勝絕對優勢敵人的進攻，依靠於在戰略退却階段中所造成的、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比較敵人開始進攻時起了變化的形勢，而這種形勢是由種種條件造成的，前面已經說過了。

然而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條件形勢之存在，還沒有使敵人失敗。這種條件與形勢，帶着若干決定勝負的性質，但還不是基本地決定勝負的東西。基本地決定勝負的東西，在於兩軍的決戰。只有決戰、才能基本地，最後的、解決兩軍之間誰勝誰敗的問題。這就是戰略反攻階段的全任務。反攻是一個長過程，是防禦戰的最精彩最活躍的階段，也就是防禦戰的最後階段。所謂積極防禦，主要的就是指的這種帶決戰性的戰略的反攻。

條件與形勢，不僅僅是在戰略退却階段中造成與形成的，反攻階段中繼續地造成與形成着。這時的條件與形勢，不完全和前一階段中的屬於同一形式與同一性質。

可以是屬於同一形式與同一性質的，例如此時敵軍的更加疲勞與減員。不過是前一

階段中疲勞與減員的繼續。

但又必然的有完全新的條件與形勢出現，例如敵軍打了一個或數個敗仗，此時的條件，所謂有利於我不利於敵者，就不僅敵軍疲勞等等，而是增加了敵軍打敗仗這個新的條件了。形勢也起了新的變化，敵軍調動忙亂，舉措失當，敵軍優劣之勢，也就不同於前了。

假使一個至數個敗仗不是屬於敵軍，而屬於我軍，那末，條件與形勢的有利與否，也變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說，敵之不利減少，我之不利開始發生，以至擴大起來，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於前的東西。

無論何方失敗，都直接的迅速的引起失敗者方面之一種新的，就是企圖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脫出這種新出現的不利於我有利於敵的條件與形勢，而重新創造出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條件與形勢去壓迫對方。

勝利者方面的努力與此相反，力圖發展自己的勝利，加敵以更大的損害，務增加或發展有利於我的條件與形勢，而務不讓其對方完成其脫出不利於挽回危局的企圖。

所以不論在何方來說，決戰階段的鬥爭，是全戰爭或全戰役中最激烈、最複雜、最變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難、最艱苦的，在指揮上說來，是最不容易的時節。

反攻階段中，問題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開始問題，集中兵力問題，運動戰問題，速決戰問題，消滅戰問題等。

這些問題的原則，不論對於反攻說來，或對於進攻說來，在其基本性質上，是沒有

區別的。在基本性質上，這些問題的原則，應用於反攻或進攻，都是相同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反攻就是進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進攻，反攻原則，是在敵人進攻時應用的。進攻原則，是在敵人防禦時應用的。在這個意義上，又都有若干的區別了。

為此理由，我雖然把作戰的許多問題統統說在戰略防禦的反攻部門中，而在戰略進攻部門中只說些另外的問題，我們應用時，却不可忽略其相同點，也不可忽略其差異點。為避重複，這裏說了的，在戰略進攻部門就不去說他了。

五 反攻開始問題

反攻開始問題，即所謂『初戰』或『序戰』問題。

許多軍事家都主張慎重初戰，不論在戰略防禦或戰略進攻皆然，而以防禦為尤甚，我們過去，曾經嚴重的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區的一至五次圍剿給了我們以豐富的經驗，研究一下這些經驗不是沒有益處的。

第一次圍剿是敵人以約十萬人之衆，由北向南，從吉安建寧之線，分八個縱隊向蘇區進攻。當時的紅軍約四萬人，集中於黃陂、小佈地區，如第一圖。

當時的情況是：（一）吉安隔在贛江之西，羅師是防衛吉安的。（二）富田、東固

一帶人民受AB團欺騙一時不信任紅軍，幷與紅軍相對立。（三）建寧遠在福建，地屬白區，劉師不一定越江入西。（四）頭陂是白區，東韶有AB團問題，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許再向西打，恐西面張譚公三師集中，不易快勝，不能最後解決問題。（五）張譚兩師是圍剿軍主力，圍剿軍總司令江西主席魯滌平的嫡系，張又是前敵總指揮，消滅此兩師，圍剿就基本上打破了。兩師各約一萬四千人，我一次打一個師是絕對優勢，張師又分置兩處。（六）整個進剿軍不過十萬人，總的形勢不十分嚴重。（七）龍岡源頭一帶人民條件好，又能蔭蔽接近。（八）龍岡有利於我之陣地，源頭不好打，如敵攻小佈就我，則陣地亦好。（九）張譚接近我之集中地。（十）中間突破打一缺口後，敵之東西諸縱隊便被分離爲遠距之兩羣。（十一）我在龍岡西南數十里之興國有一個千餘人的獨立師，可迂迴於敵後。能集中最大的兵力。基上理由，我們的第一仗就決定了而且打着了張輝瓚的主力，連師長在內全部九千人一齊俘獲不漏一人一馬。一戰勝利，譚師向東韶跑，許師向頭陂跑，我軍又追及譚師消滅他一半。五天內打兩個仗（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翌年一月一日），於是富田，東固，頭陂諸敵畏打紛紛撤退，第一圍剿就結束了。

第二次圍剿，敵之進攻與我之集中如第二圖：當時的情況是：（一）進剿軍二十萬人，何應欽爲總司令駐南昌。（二）同第一次圍剿時一樣，全部是蔣之非嫡系部隊，以十九路軍，孫連仲軍，朱紹良軍爲最強，其餘較弱。（三）AB團肅清，蘇區人民擁護

紅軍。（四）王金鈺北方新到表示恐懼，其左翼郭郝兩路，大體略同。（五）從富田打起，向東橫掃，可在閩贛交界之建黎泰地區，擴大蘇區徵集資材，便於打破下一次圍剿。若由東向西打去，則限於贛江，戰局結束後無發展餘地。若打完再東轉，又勞師廢時。（六）我軍人數雖略減（三萬餘），然有四個月的養精蓄銳。基上理由，乃決找王金鈺公秉藩（共十一個團）打第一仗，勝利後打郭，打孫，打朱，打劉，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走七百里，打五個仗，繳槍兩萬餘，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圍剿。當打王時，處於蔡郭兩敵之間，距郭十餘里，距蔡四十餘里，人謂我們為『鑽牛角』但終究鑽通了，主要因為蘇區條件，再加敵軍各部之不統一。郭師敗後，郝師星夜逃回永豐，得免於難。

第三次圍剿的敵我形勢，如第三圖。

當時的情況是：（一）蔣介石親身出馬任總司令，下分左右中三個總司令，中何應欽與蔣同駐南昌，右陳銘樞，駐吉安，左朱紹良，駐南豐（二）進剿軍三十萬人。主力軍是蔣嫡系之陳誠、羅卓英、趙觀濤、衛立煌、蔣鼎文五師、師九團。約十萬人。次是蔣光鼐、蔡廷楷、韓德勤三師，四萬人。次是孫連仲軍，二萬人。餘均非蔣嫡系，較弱，（三）進剿戰略是『長驅直入』，大不同於第二次圍剿之『步步為營』，企圖壓迫紅軍於贛江而消滅之。（四）第二次圍剿結束至第三次圍剿開始，為時僅一個月，紅軍苦戰後未休息，也未補充（三萬人左右），又繞道千里回到蘇區西部之興國集中，時敵

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況下，我們決定的第一個方針，是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而東，由敵之後方連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蘇區置於無用之地，定此為作戰之第一階段。及敵回頭北向，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為第二階段。此方針之中心是避敵主力，打其虛弱。但部隊向富田開進之時，被敵發覺，陳羅兩師趕至，我不得不改變計劃，回到興國西部之高興圩，此時僅剩此一個圩場及其附近地區容我集中了一天，乃決計往蓮塘、良村、黃陂方向進。第一天乘夜通過之蔣鼎文師與蔣蔡韓軍間之四十里空隙地，轉到蓮塘。第二天與上官雲相軍（上官指揮本師及郝師）前哨接觸。第三天打上官師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夢麟師為第二仗，爾後以三天行程到黃陂打毛炳文師為第三仗，三戰皆勝，繳槍逾萬。此時所有向西向南之敵軍主力，皆轉旗向東，集中視線於黃陂，猛烈並進，找我求戰，取密集的陣地大包圍姿勢接近了我軍。我乃於蔣蔡韓軍與陳羅軍之間一個二十里間隙的大山中偸越過去，回到西面之興國境內集中。及至敵發覺再向西進時，我已休息了半個月，敵則飢疲沮喪，無能為力，下決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蔣光鼐，蔡廷楷，蔣鼎文，韓德勤，消滅蔣鼎文一個旅，韓德勤一個師。蔣光鼐蔡廷楷兩師，則打成對峙，讓其逃去了。

第四次圍剿敵我形勢，如第四圖。

當時的情況是：敵分三路向廣昌進，主力在東路，西路兩師暴露於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於東黃陂以西，一舉消滅黎川陳時兩個師。敵從左

路分出兩個師配合中路再進，我又得消滅其一個師於草苔岡。兩役繳槍萬餘，這個圍剿就基本打破了。

第五次圍剿，敵以堡壘主義的新戰略進攻，首先佔領了黎川。我却企圖恢復黎川，禦敵於蘇區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敵之鞏固陣地兼是白區之硝石，一戰不勝。又打其東北之資溪橋，也是鞏固陣地與白區，又不勝。爾後輾轉尋戰於敵之主力與堡壘之間，完全陷於被動地位，終五次圍剿一年之久，絕無自主活躍之概。最後不得不退出蘇區。當時初戰的形勢如第五圖。

上述一至五次圍剿的經驗，證明處在防禦地位的紅軍欲打破強大的進剿軍，反攻的第一個戰鬥，關係非常之大。第一個戰鬥的勝敗給予極大的影響於全局，乃至貫澈到最後的一個戰鬥。因此得出下述的結論：

第一、必須打勝。必須敵情、地形，人民條件，都利於我，不利於敵，確有把握而後動手，否則寧可退讓，持重待機，機會總是有的，不可率而應戰。第一次圍剿先想打譚道源，僅因敵不脫離源頭那個居高臨下的陣地，我軍兩度開進，却兩度忍耐撤回，過了幾天找到了好打的張輝瓚。第二次圍剿，我軍開進到東固，僅因等待王金鈺脫離其富田鞏固陣地，寧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險。拒絕一切性急快打之建議，迫敵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終於達到了要求。第三次圍剿那樣急風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師，又被敵人發覺了我們迂迴其側後的計劃，忍耐折回，改用中間突破，終於在蓮塘打着第一個好仗

。第四次圍剿攻南豐不克，毅然採取了退却步驟，終於轉到敵之右翼，集中東韶地區，開始了東黃陂大勝仗。只有五次圍剿全不知初戰關係之大，震驚於黎川一城之得失，從企圖挽救的觀點出發，於洵口不預期遭遇戰勝利之後（消滅敵一師），却不把此戰看作第一戰及其必然引起的變化，而貿然進攻不可必勝的硝石，開脚一步就喪失了主動權，眞是最蠢最壞的打法。

第二、愼重初戰的再一個理由，在於初戰的計劃必須是全戰役計劃的有機的序幕，沒有好的全戰役計劃，絕不能有眞正好的第一仗。這就是說，即使初戰打了一個勝仗，若這個仗不但不於全戰役有利，反而有害時，則這一仗雖勝也只算敗了（如五次圍剿的洵口戰役）。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須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後一仗的大體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第一仗勝了，敵軍全局將起如何變化，假若敗了，又起如何變化。雖結果不見得乃至決不會盡如所期，然而必須依據雙方全局。仔細地切實地想明白。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眞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還要想到下一戰略階段的文章。若只顧反攻，不顧反攻勝利後，或萬一反攻失敗後，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盡得戰略指導者的責任。戰略指導者當其處在一個戰略階段時，應該計算到往後多數階段，至少也應計算到下一階段。儘管往後變化難測，愈遠看愈渺茫，然而大體的計算是可能的，前段的遠影是必要的。那種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導方式，對於政治是不利的，對於戰爭也是不利的，走一步應該看那一步的具體變

化，據此以修改或發展自己的戰略戰役計劃，不這樣做，就會弄出冒險直衝的錯誤。然而貫通全戰略階段，乃至幾個戰略階段的、大體上想通了的，一個長時期的方針，是決不可少的，不這樣做，就會弄出遲疑坐困的錯誤，實際上適合了敵人的戰略要求，陷自己於被動地位。須知敵人的最高指揮，是具有遠大戰略眼光的。我們只有使自己操練得高人一等，才有戰略勝利的可能。五次圍剿及張國燾路綫的戰略指導之所以錯誤，主要的就在於這一點。因此，退却階段時必須計算到反攻階段，反攻階段時必須計算到進攻階段，進攻階段時又必須計算到退却階段。沒有這種計算，束縛於眼前的利害，對於戰爭是十分不利的。

必須打勝，必須照顧全戰役計劃，必須照顧下一戰略階段，這是反攻開始，即打第一仗時，不可忘記的三個原則。

六　集中兵力問題

這個問題看來容易，實行頗難。人人皆知以多勝少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的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於缺乏戰略頭腦，為複雜的環境所迷惑，因而被支配於環境，失掉自主能力，採取了應付主義。

無論怎樣複雜、嚴重、慘苦的環境，軍事指導者的頭腦，首先需要的是獨立自主地

組織與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敵逼迫到被動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在於迅速恢復主動的地位，如果不能恢復到這種地位，下文就是必然的失敗。

主動的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體的物質的，這裏最重要的，是保存並集結最大而有活力的軍隊。

防禦戰本來容易陷入被動地位，防禦戰大不如進攻戰之能夠充分的發揮主動權。然而防禦戰是能夠從被動的形式納入主動的內容的，是能夠由形式上的被動階段轉入形式上內容上的主動階段的。完全有計劃的戰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內容上是保存軍力待機破敵，是誘敵深入準備反攻。只有不肯退却，倉卒應戰（例如硝石戰役），表面上似在力爭主動，實際上是被動的。戰略反攻，則不但內容是主動的，形式上也放棄了退却的被動姿勢。對於敵人，反攻是我軍強迫他放棄主動權，同時即授與以被動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達到這種目的，集中兵力，運動戰，速決戰，消滅戰，都是必要的條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與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為了改變敵我形勢。第一，是為了改變進退形勢。過去是敵進我退，現在是企圖達到我進敵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戰而勝，這個目的在本戰鬥就達到了，也給與影響於全戰役。

第二，是為了改變攻守形勢。退却到退却終點，在防禦戰中基本上屬於消極階段，

即「守」的階段。反攻則屬於積極階段，即「攻」的階段。雖然在整個戰略防禦中並沒有脫離防禦性質，然而反攻與退卻相較，不但形勢上，而且本質上，是起了變化的東西。反攻是戰略防禦於戰略進攻之間的過渡的東西，帶着戰略進攻前夜的性質，集中兵力就為達此目的。

第三，是為了改變內外線形勢。處於戰略上內線作戰的軍隊，特別是中國紅軍的被圍剿環境，蒙受着許多的不利。但我們可以而且完全應該在戰役或戰鬥上，把他改變過來。將敵軍對我軍一個大圍剿，改為我軍對敵軍的許多各別的小圍剿，將敵軍對我軍戰略上的分進合擊，改為我軍對敵軍戰役或戰鬥上的分進合擊，將敵軍對我軍戰略上的優勢，改為我軍對敵軍戰鬥或戰役上的優勢。將戰略上處於強者地位的敵軍，使在戰役或戰鬥上處於弱者地位。同時，將自己戰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變為戰役上或戰鬥上的強者地位。這即是所謂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圍剿中的圍剿，封鎖中的封鎖，防禦中的進攻，劣勢中的優勢，弱者中的強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動中的主動。從戰略防禦中爭取勝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蘇維埃戰史中，這個問題常常成為重要的爭論問題。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實行歸進與攻擊，幸而敵人（鄧英師）自己逃走了，我們的攻擊本身並沒有奏效。

從一九三二年開始，有所謂「全線出擊」的口號，要求蘇區東西南北四面出擊，這

不但在戰略防禦時不對，就是戰略進攻時也是不對。無論什麼時候，也無論戰略或戰術，都有防禦與進攻，箝制與突擊的兩方面，事實上絕少所謂『全線出擊』。全線出擊的口號，是伴着軍事冒險主義而來的軍事平均主義。在革命前進時，當作一個政治口號是對的，但當作軍事口號就不對了。

軍事平均主義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謂『兩個拳頭打人』的說法，把紅軍主力分割為二，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同時求勝。那時的結果是一個拳頭置於無用，一個拳頭打得很疲勞，而且沒有當時可能取得的最大勝利。照我的意見，不論一萬兵一百萬兵或一千萬兵，主要的使用方向只應有一個。不應有二個。我不反對作戰方向有二個或二個以上，但主要方向，在同時間內，只應有一個。歐戰時強大的德軍，同時間的主要作戰方向始終只有一個。軍事評論家對於一九一四年八九月間因東普魯士危急抽調西戰場少數兵力東援，還有認為錯誤的。假如西戰場的不得手，這個抽調是其主要原因或原因之一的話，那末，這個批評是正確的。中國紅軍以弱小的姿態出現於內戰的戰場，其迭挫強敵震驚世界的戰績，原因於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無論那一個大勝仗，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是戰略的說法，是對整個戰爭整個敵我對比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確是如此。不是對戰役與戰術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決不能如此。無論在反攻或進攻，我們總是集結大力打敵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甯都東韶打譚道源戰役，一九三一年八月的興國高興圩打十九路軍戰役，一九三二年七月南雄水口圩打陳

濟棠戰役，一九三四年三月黎川團村打陳誠戰役，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虧。如像水口坪與團村這一類的仗，本來一般算作勝仗，而且還算作大勝仗的（前者擊潰陳濟棠二十個團，後者擊潰陳誠十二個團），然而我們歷來就不歡迎這種勝仗，在某種意義上簡直還可以說他們是敗仗。因為沒有繳獲或繳獲不超過消耗，在我們看來是很少意義的。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百』，這個相反相成的道理，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法則之一。

軍事平均主義，到一九三四年五次圍剿時，發展到了極點。『六路分兵』，『全綫抵禦』，以為可以制敵，結果為敵所制，原因在於懼怕喪失土地。集中主力於一個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箝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損失。然而還是暫時的局部的損失，其代價是突擊方向取得了勝利。突擊方向勝利了，箝制方向的損失就可以恢復了。一二三四次圍剿都遭受了土地的損失，特別在三次圍剿時蘇區幾於全失，然而結果不但都恢復了，而且擴大了土地。

由於看不見蘇區人民的力量，發生懼怕紅軍遠離蘇區的錯誤心理。這個心理在一九三二年紅軍打漳洲時，一九三三年四次圍剿勝利後紅軍轉向福建進攻時，都曾發生過。前者懼怕整個蘇區被佔，後者懼怕蘇區一部被佔，而主張分兵把守，結果都證明不對了。在敵人看來，一方面蘇區是畏進，一方面打到白區去的紅軍是他們主張的危險物，所以敵軍的注意力總是向着主力紅軍的所在地，拋開主力紅軍而專向蘇區，是很少這種事

情的。在防禦時，紅軍也是主要的吸引力。縮小蘇區的計劃是敵人戰鬪計劃的一部份，但如果紅軍集中主力消滅其一路，敵人就不得不把注意力與軍力更大的向着紅軍。所以敵人縮小蘇區的計劃也是能夠被破壞的。

「堡壘主義的五次圍剿不能集中作戰，只能分兵防禦從事短促突擊」的這種方法，也是不對的。三五里一進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壘主義作戰法，不小的成份是紅軍自己的節節抗禦促成的。如果在內線放棄節節抗禦的戰法，再則必要時轉向敵人的內線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種。集中兵力的法則，正是戰勝堡壘主義的工具。

立三主義主張廢棄人民武裝與小的游擊戰爭，「一枝槍也集中到紅軍中去」，早已證明是不對的了。人民武裝與小的游擊戰爭在蘇維埃戰爭看來，是和主力紅軍同為一個人的兩隻手，只有主力紅軍而無人民武裝與小的游擊戰爭，僅僅是一個獨臂將軍。蘇區的人民條件，具體說來，特別對於作戰說來，就是武裝起來了的人民。敵人視為畏途，主要的也在這一點。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棄人民武裝與小的游擊戰爭在內。

置紅軍的支隊於次要的作戰方向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證對於戰場作戰的絕對或相對優勢的原則上。對於強敵，或關係緊要的戰場作戰，應以絕對優勢兵力臨之，例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集中四萬人打張輝瓚的九千人。對於弱敵或不關緊要的戰場作戰，臨之以相對優勢的兵力也就夠了，例如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二次圍剿的最後一戰——向建寧打七千人的劉和鼎，紅軍只以一萬多人去打他。

（十）也不是每次都要優勢兵力，在某種情況下也可以相對劣勢或絕對劣勢兵力出現於戰場，前者例如某一區域僅僅有一支不大的紅軍（不是有兵而不集中），當某一優勢敵人進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條件能給我們以大的援助時，以游擊隊或小支隊箝制其正面及一翼，紅軍集中全力突然襲擊其另一翼之一部份，當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勝利的。當我襲擊其一翼之一部份時，兵力的對比仍適用以優勢對劣勢，以多勝少的原則，後者（絕對劣勢）例如游擊隊襲擊白軍大隊伍，僅僅是襲擊其一小部份，同樣適用上述的原則。

集中大軍於一戰場作戰，受限制於地形、道路、給養、居處等的說法，也應該分別的去看。這些限制對於紅軍與白軍是有程度上的區別的，因為紅軍較之白軍能夠忍受更大的困難。

我們是以少勝多的——我們向整個中國統治者這樣說。我們又是以多勝少的——我們向戰場上作戰的敵人這樣說。這件事情已經不是秘密，敵人一般都摸熟了我們的脾氣了。然而敵人不能取得我們的勝利，也不能避免他們的損失，因為何時何地我們這樣打他們，他們不曉得。這一點我們是秘密的，紅軍的作戰一般是奇襲。

七　運動戰

運動戰還是陣地戰？我們的答覆是：運動戰。在沒有優勢兵力，沒有彈藥補充，每一個蘇區中打來打去僅只一個紅軍的條件下，陣地戰對於我們是基本無用的，陣地戰，對於我們，不但防禦時基本的不能用他，就是進攻時也同樣不能用。

由於敵人強大與紅軍技術貧弱所發生的紅軍作戰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沒有固定的作戰線。

紅軍的作戰線，服從於紅軍的作戰方向，作戰方向不固定，影響到作戰線不固定。大方向雖在一個時期中是不變更的，然而大方向內的小方向則是隨時變更的，一個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轉到另一方向去。一個時期之後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連這種大方向也得變更了。

革命的內戰時期，作戰線不能固定，就在蘇聯也有過這種情形。他們與我們不同的地方，在於不固定程度不如我們之甚。一切戰爭也不能有絕對固定的作戰線，勝負進退的變化不許可如此。但相對固定的作戰線往往見之於一般的戰爭。惟獨敵強我弱懸殊像處在目前階段的中國紅軍這樣的軍隊，則是例外。

作戰線的不固定，影響到蘇區領土的不固定，時大時小，時縮時伸是經常的，此起彼

常也往往發生，這種蘇區領土的流動性，完全來源於戰爭的流動性。

戰爭與蘇區領土的流動性，影響到蘇維埃建設也發生流動性。若干年月的建設計劃是不能設想的，計劃改變的頻繁，是我們家常便飯的事情。

承認這種特點，對於我們是有利益的。從這個特點出發，規定我們的日程，不要幻想有進無退的戰爭，不要震驚於蘇區領土與軍事政治後方的暫時流動，不要企圖建立長時期的具體計劃。把我們的思想、工作適應於情況，準備坐下，又準備走路，不要把乾糧袋洒掉了。只有從現在的流動生活中才能爭取將來的比較不流動，才能爭取最後的固定。

統治於五次圍剿時期的所謂「正規戰爭」的戰略方針，否認這種流動性，反對所謂「游擊主義」，當作一個大國家的統治者來辦事，結果是得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大流動——二萬五千里長征。

我們是一個國家，但今天我們還是一個不完全的國家，今天我們還處在內戰的第一時期，距離完全國家還很遠，我們軍隊的數量與技術較之敵人還差得遠，我們的領土還很小，我們的敵人時時刻刻想要消滅我們才快活。從這個上面建設我們的方針，不是一般的反對游擊主義，而是老老實實的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在這裏怕羞是沒有用的，相反，游擊性正是我們的特點，正是我們的長處，正是我們戰勝敵人的工具。我們應該準備拋棄游擊性，但今天還不能拋棄。游擊性在將來一定是可羞的與必須拋棄的東西，但在

今天却是寶貴的與必須堅持的東西。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天下就沒有只承認打不承認走的軍事家，不過不如我們走的這麼厲害罷了，對於我們，走路的時間通常多於作戰，平均每月打得一個大仗就算好的。一切的『走』都爲着『打』，我們的一切戰略戰役方針都建立在『打』的一個基本點上。然而在我們面前有幾種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敵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敵人雖不多，但與其鄰近敵人十分密接，也有時不好打。第三是一般的說來，凡不孤立而佔有十分鞏固陣地之敵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決戰鬥時，不好再繼續打。以上這些時候，我們都是準備走的，這樣的走是許可的，是必須的。因爲我們承認必須的走，是在首先承認必須的打的條件之下的，紅軍運動戰的基本特點，就在這裏。

基本的是運動戰，並不是拒絕一切陣地戰，戰略防禦時，鉗制方面某些支點的固守，戰略進攻時孤立無援之敵，都是應該承認用陣地戰去對付的。採取這樣的陣地戰制勝敵人的經驗，我們過去已經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壘、寨子，被我們打開，某種程度的敵人野戰陣地被我們突破。以後還要增加這一方面的努力，補足我們這一方面的弱點。我們完全應該提倡那種在情況需要而且許可下的陣地攻擊與陣地防禦。我們反對的，僅僅是在今天採取一般的陣地戰，或把陣地戰與運動戰平等看待，這些才是不能許可的。

紅軍的游擊性，沒有固定作戰綫，蘇區的流動性，蘇維埃建設的流動性，十年戰爭

中一點也沒有變化嗎？是有變化的，從井崗山到一次圍剿爲第一階段，這個階段中游擊性與流動性是很大的，紅軍還在幼年時代，蘇區還是游擊區。從一次圍剿到三次圍剿爲第二階段，這個階段中游擊性與流動性就縮小了許多，方面軍已經建立，蘇區根據地也已經建立。從三次圍剿至五次圍剿爲第三階段，游擊性與流動性更縮小了，蘇維埃中央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建立。長征是第四個階段，由於否認小游擊與小流動就來了一個大游擊與大流動。目前是第五個階段，由於沒有戰勝五次圍剿與大流動的結果，紅軍與蘇區均相對的縮小了，但又已經在西北建立了根據地，紅軍主力三個方面軍已經統一指揮，爲前次所未有。

依戰略的性質說，也可以說井崗山至第四次圍剿爲一階段，五次圍剿爲又一階段，長征至今爲第三階段。五次圍剿時否認了以前的方針，我們今天又否認了五次圍剿的方針，復活了從前的方針。然而不是否認五次圍剿時的一切，也不是復活從前的一切，復活的是從前優良的東西，否認的是五次圍剿時錯誤的東西。

游擊主義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規性，就是不集中，不統一，缺乏紀律，簡單現象等，這些東西是紅軍幼年時代本身帶來的，有些在當時還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高級階段，必須逐漸地自覺地去掉他，使之更集中些，更統一些，更有紀律些，更複雜化些，就是使之更帶正規性。在作戰指揮上，也應逐漸地自覺地減少那些在高級階段所不必要的游擊性。在這一方面拒絕前進，固執地停頓於舊階段，是不許可的，是有害的，是

不利於大規模作戰的。

另一方面是運動戰，是現在還需要的戰略與戰役作戰的游擊性，是無法阻止的蘇區流動性，是蘇維埃建設計劃的靈活變更性，是紅軍建設不要不適時宜的正規化。在這一方面拒絕歷史，反對保留有用東西，冒然地脫離現階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當前沒有現實意義的、所謂「新階段」，同樣是不許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於當前作戰的。

我們現在是處在紅軍技術與組織的下一新階段的前夜，我們應該準備轉變到新階段去。不作這種準備是不對的，是不利於將來的戰爭的，在將來，紅軍的技術與組織條件改變了，紅軍建設提到了新階段，紅軍的作戰方向與作戰線之比較固定就出現了，陣地戰增加了，戰爭的流動性、蘇維埃領土與建設的流動性，大大減少了。到最後，也就會消滅了。現時所受的限制，如像優勢的敵人，鞏固的陣地等等，就有法子克服了。

我們現在一方面反對五次圍剿時的錯誤的與過早的辦法，另一方面也反對復活五次圍剿以前紅軍幼年時代的一切非正規性。但是我們堅決地恢復紅軍一路來用以打勝仗的許多可寶貴的戰略戰術的原則。同時也吸收五次圍剿鬥爭中關於紅軍建設方面與作戰方面某些優良的與有益的經驗。並且把所有一切過去優良的東西都總結起來，成為有系統的更發展的更豐富的軍事路綫或戰略路線，爭取在今天戰勝我們的敵人，並且準備着轉變到新階段去。

運動戰的實行方面，問題是很多的，如偵察、判斷、決心、戰鬥部署、指揮、蔭蔽、迅速、集中、開進、展開、攻擊、追擊、襲擊、陣地攻擊、陣地防禦、遭遇戰、退却、夜戰、特種戰鬥、避強打弱、圍城打援、佯攻、防空、處在幾個敵人之間、超越敵人作戰、連續作戰、無後方作戰、養精蓄銳之必要等等，這些問題在紅軍作戰史中都表現許多的特點，戰役學中將有條理的敍述及之，應給一很好的總結，我在這裏不贅述了。

八　速決戰

戰爭的持久戰，戰役與戰鬥的速決戰，這是一件事的兩方面，這是中國蘇維埃戰爭的兩個同時並重的原則，也可以適用於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

因爲統治勢力的雄厚，革命勢力是逐漸生長的，就規定了戰爭的持久性，在這上面性急是要吃虧的，在這上面提倡「速決」是不正確的。幹了十年的蘇維埃戰爭，對於別的國家也許是値得驚奇的，對於我們却好似八股文章還只作了破題、承題、與起講，許多熱鬧文章都還在後面，往後的發展，在一切內外條件的影響下，無疑比較過去有大大增高速度之可能，因爲國際與國內環境已經起了變化，而且會有更大的變化在後面，可以說我們已經脫離了過去的那種慢慢發展與孤軍作戰的景況。然而不應該打算明天就會

成功。『滅此朝食』的氣概是好的，『滅此朝食』的具體計劃是不好的。因爲半殖民地中國的統治勢力，是許多帝國主義加上國內反革命，國內革命勢力沒有聚集到足以突破內外敵人的主要陣地以前，國際革命勢力沒有直接大量援助中國革命以前，我們的革命同戰爭依然是持久的。從這一點出發，規定我們的長期作戰的戰略方針，是戰略指導的重要原則之一。

戰役與戰鬥的原則與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決，在這個上面爭取速決，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戰爭問題，古今中外都無不求速決，曠日持久總是認爲不利的。惟獨中國戰爭不能不以最大忍耐性對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戰對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線時譏笑我們的『打拳戰術』（說的是打過來打過去才能奪取大城市），譏笑我們要待白髮才能看見革命的勝利，這種表現革命急性病的情緒，早已證明是不對了。但這些意見如果放在戰役與戰鬥上面去說，則是非常之對的。原因在於：第一，紅軍的武器尤其彈藥沒有來源；第二，白軍有多個，紅軍只有一個，打破一次圍剿要準備迅速的連續戰；第三，白軍各個雖分進然多是比較的密集，打他一個、如不能迅速解決戰鬥，其餘各個就都來了。爲了這些理由，不能不採取速決戰。對於我們，幾小時、一天、或兩天解決一個戰鬥是經常的。只有在『圍城打援』的方針下，目的不在打圍敵，而在打援敵，對圍敵是準備着相當地持久的，但對援敵仍然是速決。戰略防禦時固守鉗制方面的據點，戰略進攻時打孤立無援之敵，消滅蘇區中的白色據點，這些時候也常常給與戰役或戰鬥的持久方

針。然而這些持久戰，只有幫助而並不妨礙主力紅軍的速決戰。

速決戰不但是心裏想要如此就成功的（心裏想要當然是首先重要的），還須加上許多具體的條件，主要的是準備充足，不失時機，集中優勢兵力，包圍迂迴戰術，良好陣地，打運動中之敵或駐止中而陣地不鞏固之敵。不解決這些條件，而求戰役或戰鬥速決，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圍剿屬於一個大戰役，依然適用速決原則，而不是持久原則，因為蘇區的人力財力軍力條件都不許可持久。

但在一般速決原則之下，反對不正當的急燥性是必要的。一個蘇區的最高軍事政治領導機關，估計到蘇區的這些條件，估計到敵方情況，不為敵之其勢洶洶所嚇倒，不為尚能忍耐的困難所沮喪，不為某些挫折而灰心，給予必要的耐心與持久，是完全必要的。中央蘇區打破第一次圍剿，從初戰到結束只有一星期，第二次圍剿只有半個月，第三次圍剿就熬上三個月，第四次是三星期，惟獨第五次熬了整整的一年。第五次圍剿最後突圍還表現了倉卒，依情況還可熬上二三個月用以休息訓練紅軍，假如這樣，又假如突圍後的領導稍為聰明一點，情況便將有很大的不同。

雖然如此，仍不破壞力爭縮短全戰役時間的原則。除了戰役戰鬥計劃力爭集中兵力與運動戰等等條件，務期在內綫（在蘇區）消滅敵之有生力量、迅速解決圍剿以外，當圍剿已經證明無法在內綫解決時，應該使用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綫，轉入我之外綫敵

之內線去解決這個問題。堡壘主義發達的今日，這種手段將要成為經常的作戰手段。五次圍剿進行兩個月之後，當福建事變出來之時，紅軍主力無疑應該轉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迫使進攻蘇區之敵不得不回援其根本重地，用這種方法粉碎其向蘇區的進攻，並用這種方法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而且確定地援助了他。此計不用，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當着打了一年之時，此時雖不利於出浙江，但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株州長沙與常德，包括湖南的大部份在內，作為自己的戰略活動地帶，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用此以打破圍剿，保衛蘇區。此計又不用，打破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後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九　殲滅戰

『拚消耗』的主張，對紅軍是不識時宜的。『比賽』的玩藝兒，不是龍王向龍王，而是乞丐向龍王，未免有點滑稽。對於自己一無所有一切取給敵方的紅軍，基本的方針是殲滅戰。只有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才能解決圍剿與發展蘇區。給敵以殺傷，是作為給敵以殲滅的手段而採取的，否則便沒有多大意義。因給敵以殺傷而給我以消耗，又因給敵

以殲滅而給我以補充，這是市場交易法則應用於戰爭。擊潰戰對雄厚之敵不是基本上決定勝負的東西，殲滅戰對任何敵人都立即起了決定的影響。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團不如殲滅其一個團。

對一、二、三、四次圍剿。我們的方針都是殲滅戰，每次殲滅的敵人對於全敵不過一部份，然而圍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圍剿，我們的方針反其道而行之，實際上幫助敵人達到了目的。

高興圩，水口圩一類的戰役是不足為法的，歷來都認為是蝕本生意。我們的經與是必須有所繳獲。

殲滅戰與集中優勢兵力及採取包圍迂迴戰術，同一意義，沒有後者，便不能有前者。人民贊助，良好陣地，好打之敵，出其不意等條件，都是達到殲滅戰不可少的。擊圍殲師之敵被殲滅的事，事實上當然是不常見的，但一有可能，我們的計劃就應向着他。爭取大部殲滅，是我們經常計劃的出發點。

擊潰有意義，乃至讓敵逃去有意義，是對於全戰鬥或全戰役中我軍主力對確定之敵舉行殲滅戰而發生的，否則便沒有什麼意義。這又是一種有所失對有所得而有意義的塲合。

蘇區建立軍事工業，須使之不助長依賴性。我們的基本方針應該依賴帝國主義與國內敵人的軍事工業，倫敦與漢陽的兵工廠我們是有權利的，並且經過敵人的運輸隊而送

來，這是眞理，不是笑話。某處地方紅軍曾經不知此眞理，那裏的兵工廠（雖然不大）出品最優，那裏的紅軍最少打勝仗。

全世界又將有一場大消耗戰要到來，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已曾大拚其消耗，然而這不足爲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革命暴動與革命戰爭所取法。這樣的暴動與戰爭，主要的依靠進攻與消滅對手而解決自己的問題。

II
A43
50

0.15

715

9376